

# 放論集

徐玉振



李素心著

群力出版社印行





3 0614 6023 8

## 前記

這本東西，有些四不像，雜感，隨筆，散文，乃至論文都有，嚴格說起來，又都不能算是雜感，隨筆，散文，或者論文，那麼就作為小品文之新形式的嘗試吧？

抗戰以後，個人的生活飄忽不定，由戰地而城市，由後方面而前方，苦頭是吃了，但是自己不曉得對國家民族有了什麼貢獻？心境是沉悶的沉悶到無可抑壓的時候，便如決了口的黃河，滿腔的積憤，一齊傾瀉出來了。從這些所選的零星短文中，可以隱約窺見幾年來作者的生活痕跡和沉悶的心境！

我一向是主張坦白的，有什麼說，就得說一個痛快，我最討厭那些吞吞吐吐和假仁假義的偽君子，雖然心直口快，會遭人家的猜忌，在我却管不了許多。

或許有人家會誤會我是在攻擊誰，或者罵罵誰，其實，都錯了，除了在真理面前，我對誰都沒有所愛憎！

臨了，這本小冊子出世，我沉悶的心緒交給它給我帶走吧！

素心 一九四二，夏，病中記於江西泰和

# 放論集目錄

## 第一編

新事業與新作風.....	一
論三種政治作風.....	三
確立用人標準.....	七
小公務員的生活問題.....	一〇
論當前人與事的脫節現象.....	一三
漫論前方與後方.....	一八
貪污新論.....	二〇
五月論.....	二二
革命論.....	二五

## 第二編

三重人格論.....	三一
------------	----

856.9  
285  
2



487835

放論集目錄

二

三種人論……………三五  
想入非非……………三七  
想想自己……………三九

第三編

把握主題……………四一  
開韶少說……………四二  
「新屬具」的沒落……………四三  
雲成論……………四五  
雲成再論……………四八  
是交際動員的時候……………五二  
希冀于郭沫若先生……………五四  
魯迅的悲哀……………五八

# 第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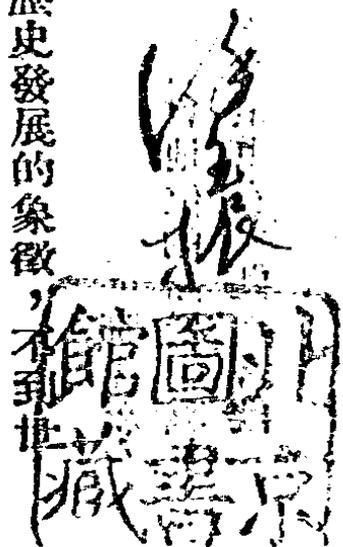
## 新事業與新作風

一切都在動，一切都在變，這種動與變也就是時代推進，和歷史發展的象徵，不到世界毀滅和宇宙的末日，動與變永遠不會停止。

新的事業，就是根據歷史發展之新的要求而來；由於對新事業不斷的創造與完成，社會始有飛速的前進！

在中國，正是處在一個封建末期的歷史階段，我們要使中國由封建社會跳躍過資本主義社會，而直接踏入大同社會，在這個階段上，歷史對我們的要求特別迫切而苛刻，因此，新事業的建立，也格外廣泛。事實上，在五十餘年的國民革命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新的運動，新的建設，以及許許多多新的花樣，也就是說倡導了許多新的事業，然而這些新的事業，是否已澈底的完成？曾否收到十分效果？這是很大的疑問。爲什麼許多新的事業，不能完成與沒有成效呢？不容說這是執行的問題，做的方法問題，換句話說，亦即作風的問題。

有些人，非常聰明，能看清時代的動向，和抓住當前的需要，提倡新事業，這原是很



對並且很好。可是在其實踐上，乃是採取傳統的一成不變的老作風，一種簇新的事業，以老的辦法與老的方式去進行，不僅不能收效，勢必連事業的本身，也起了質的變化，結果則是撲空。

而況，所謂老的作風，可以說是封建渣滓的殘留，具體地講，它表現有以下諸特徵：第一、由上而下的，公式化的，命令化的；進行任何一件事，照理應該從下而上的打好基礎，但傳統的官僚主義作風，却是只顧上面樹立一個空心架子，不管下面有無實在基礎。並且事事如此，時時如此，成爲一種公式化的運用。至於進行活動，其方法則是左一個命令，右一個命令，命令出門，萬事了結。

第二、操縱的，壟斷的，包而不辦的；做任何一種事業，並不是爲着使事業的本身能夠成功，而是把事業當作個人登龍的工具，因此，不能使一般人或廣大的社會羣衆與。祇是少數人從中操縱，壟斷一切，並且是包而不辦，位置要佔，權力要爭，實際工作，則毫不問津。

第三、論地位的，分等級的；舉辦一樁事情，不是以那一些人適合做這件事，那末就交給那一些人執行，更不是以能力與興趣去決定執行的人選，而是論社會地位的高低，職業等級的上下，那一種事，是那一人包辦，等級分明，毫無紊亂。至於其在主觀與客觀上，是否適宜，那可以不管。其本身有無能力與興趣？也可以丟在一邊。

以上所舉，是我國老的作風之主要特徵，這種作風，完全是封建時代的產物。目前我們已脫離了封建的桎梏，向新的社會路向前進，這種老作風照理應該早為歷史所清算，然而事實上還有不少人在公開底運用它。他們牢牢的抱住這個古董不肯放手。與其說他們是不懂得不斷運動與不斷變革之客觀發展的道理，倒不如說他們是別有用心與別有企圖。

封建的渣滓。阻礙我們新社會的進展，一切不合時代和生質效的辦法與方式，我們應澈底的丟棄與掃除。一切老的作風也必須澈底的打破！

創導新事業，應該建立新的作風，新的作風是以事業本身之成功為前提，而採取一切適當與有效的方法。

同時，一種新的社會事業或運動之展開，必須使廣大的社會羣參加實踐，其達成任務，纔有希望。

## 論三種政治作風

——1包而不辦的「關門主義」2敷衍塞責的「報

銷主義」3「拖，推，拉，」的「三手主義」——

看到趙景三兄澈底改變政治作風（見東南評論第二期）一文，使我不期然的聯想起從悠久歷史遺傳下來，而且目前還殘存的三種政治作風，這三種政治作風，一下子要「改變

「做到」澈底，似乎不容易，但把它說出來，大家總得「改變改變」。

政治制度，是立足於「法」的基礎上，政治之靜的本質，政治作風，就是「人」對政治之動的運用，政治制度必須透過政治作風，才能發揮高度的效用，祇有健全政治作風，始能推進政治制度向更高更完美的階段發展；也就是說，政治上靜的本質，和動的運用，必須有機底配合，並且動的運用該是有突破靜的本質的可能的趨勢那末才能促使政治有飛速的進步。

然而，在中國除久久停滯在封建制度的歷史不去談它，單就辛亥革命以後而論，在政治上規定了許多新的比較完善的政治制度，而經過三十年代，進步還是非常緩慢，成就還是非常微渺，無疑底，這是由於實踐的不力，執行的不夠，只有靜的本質之充實，沒有動的運用之加強。換言之，就是政治作風，配不上政治制度，這就等於經濟上的生產力跟不上生產關係，那當然只有是「落空」了。

講了上面這一套，無非是說明政治作風的重要性而已。一向遺傳下來，和現實中還可以隨處找得到的政治作風，是那三種呢？

第一種，包而不辦的關門主義：凡事自己不想做，也不讓別人做，假如是限於命令，格於面子，非做不可的話，也得須由自己主持，一手包攬，如果包下來，真是實實在在的做，倒也無話可說，可惜的是「包而不辦」，名義要頂，責任不負，真的幹那却不來，這

種事實，尤其是在中下層行政人員，特別表現得充分，一個縣長規定的職務，已是很多，還要把地方上的左一個委員，右一個主席，拉到頭上，名目之多，連其自己也記不清楚，試問還談得上對職務的盡責嗎？而一種組織，一種工作的產生，總有其意義與需要，以有意義，有需要的組織或工作，給他包而不辦，真是一冤哉枉也已了。

爲什麼要包而不辦？這就是因爲奉行「關門主義」，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有着血緣關係，這些忠實信徒在政治活動的領域中，劃下許多大圈圈，許多小圈圈，一件事進入圈圈，非「圈圈中人」休想過問和插足。橫立門戶，關緊大門，關門主義者，從窗子中伸出頭來說話：「這筆財產，我們有先佔的優先權，雖然我們不會使用它，但他人莫想染指」，關門主義云云，原來如此。

第二種，敷衍塞責的報銷主義：專門講究表面漂亮，不顧及實際效果，此道皇皇明令，由上而下，接着是洋洋灑灑，詳細細細的復呈，由下而上，紙上談兵，誠然好聽，如果窮根究底，檢查實際，則是模模糊糊，空空洞洞。這便是所謂級級敷衍，層層塞責。表面敷衍，塞責，的風氣，在當前的政治界還是有其普遍性，對於公務員上辦公廳有這樣的流行語「簽簽到，看看報，談談天，抽抽烟」，這雖是言過其實，而由此可見公務員對於「公事」，大都是敷衍塞責，這種敷衍塞責，是源淵於「報銷主義」所謂「報銷主義」，就此方會計造報銷，祇要數目算對，單據則可以多刻些圖章在身邊，報銷上去完事，並

無其他目的。

一般吃公事飯的也是如此，有幾件「公事」辦幾件，辦完就「拉倒」，至於辦這件「公事」的目的何在？希望收效如何那都不管。

主管人員，奉到命令，等因奉此的轉下去，再等因奉此的復上來「算數」，可以不復的就束之高閣，至於做不做，或者做的成效如何，那是不關重要的另一問題。

無論佐治人員也好，主管人員也好，因為他一個月拿了幾十元或幾百元薪水，負着一個責任，所以不得不辦辦公事，或復復呈文，這種「辦辦公事」，復復呈文」便是「敷衍以塞責」，也就是對「薪水和責任」的報銷」，報銷主義，就是這樣的解釋。

第三種，「拖、推、拉」的三手主義：拖者，遇困難拖延也；推者，遇責任推諉也；拉者，遇利益拉住也。這「拖、推、拉」算是有根據，然則「三手主義」從何說起呢？因為「拖、推、拉」三字都有一個斜手旁，這種政法作風，無以名之，特擬其名曰「三手主義」，這個名詞，倒蠻新穎，用用恐也無妨。

關於拖、推、拉，不是個人捏造，祇要睜開眼睛，處處都可看到；一個困難問題發生，或者奉到一個難辦的命令，不好好底想辦法，而是覺得束手無策，「籌莫展」，於是拖延復拖延，雖經層峯三令五申，催促辦理，總還得藉故拖延，等到日子「長」，時過境遷，就不了了之了。

至於有了大的責任，便用盡方法，推給他人，尤其是政界之常事。拉呢？那更不用說了。對於權力，金錢，地位，要是誰不會拚命的拉，那誰就不配在政界上混了！（？）

而且這「三民主義」，似乎也具有三民主義那麼的連環性。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不能分割。三大問題一次革命，而拖、推、拉、三者也天生無法分開，因為會拖的人一定會推又會拉；會推的人，一定會拖又會拉；會拉的人，一定會拖又會推，這便是三種風格，兼於一身。

這三種政治作風，阻礙了中國歷史的發展。目前雖然所存的祇是殘餘，但我們必須認定它是政治上最大的仇敵，我們得以最大的努力，打破它，粉碎它，以最高的熱情，創造和建立適合歷史需要的新的政治作風。

## 確立用人標準

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傳統，一切事業的興廢，完全建築於「人」的身上，所謂「為政在人」，「先人治而後法治」一類古話，在社會演進的長期過程中，有很大的支配勢力，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着重人治。

事實也該如此，因為法的本身，就是人所創立，法的能否發揮效率，也視人的執行如何以為斷，難怪「一切決定於幹部，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目前更為時髦而響。

五十年來革命的努力，迅速的推進了中國的文物制度，根據這種偉大的革命精神所建立的制度，當然是適合需要而比較完善；然而今日社會機構與政治機構中不能諱言還是有矛盾和缺陷的存在，這是什麼道理？無容說。這是人的問題，是人的不健全，是人才的缺乏，本來選舉考試都會風行一時，人才爲什麼還是缺乏？歸根結底，實是由於沒有真正的確立用人的標準。

過去根據什麼用人；照個人看法，不出以下兩途：一爲關係主義，一爲資格主義。關係主義是中國的古董貨；資格主義是外洋的舶來品。試加申論：

關係主義的「關係」，包括「裙帶關係」，「宗派關係」，「朋友關係」，「利害關係」等等一切公與私的關係，用人，薦人，看關係的深淺而定；而論關係的深淺，當然以「裙帶關係」爲首，因爲自古至親莫如夫婦，由夫婦而來的，自然是至親至戚，即使是彼桶中自應儘先援引；其次是「宗派關係」，同派同系，同一個圈兒，自然應該互相幫忙，互相捧場；再次爲「朋友關係」以及「利害關係」等等而下之的關係，如有機會用人，依此關係，決定先後，非關係人不用，成爲普遍的現象，一個縣長調任，舊的職員跟着「齊開差」，換來的是新縣長的親戚，朋友，同學，同派，同系，這是從關係中找人，以關係而用人，中國向來如此，所以是古董貨。

資格主義是專門講究出身。一般人都有「一種偏見」，以爲出身好的都是人才，出身不好

的都不成才；用一個人，先要問他是什麼學校畢業，留洋生，碩士，博士，了不起，這件事非請教他不可；專科生，大學生，資格還馬馬虎虎，給他個把中下級職位；至於沒有進過大學的，那就資格不合，不能作事。這是廢除科舉，興辦學堂以來的事，而是學歐美榜樣的，所以是舶來品。

以上兩種用人的途徑，固然不能完全抹殺他的優點；關係深，則「相知有素」，其信其行，可收大效；資格好，則「學問淵博」，無所不知，馬到功成。

但，因為講關係，一般人便專事奉迎，到處鑽營，廣事拉攏，拍馬吹牛，無所不至，而將真實的學識才幹，倒反忽略。這就在「朝中有人，就可做官」了；因為靠資格，致使多數青年，日夜追求的是文憑，念念不忘的是頭銜，有印文憑，得到頭銜，那就神氣括括，在社會上橫衝直撞，並且到處受人歡迎，因而萬事俱足，不求上進（不在此例者當然不少）何況資格雖好，也不一定就是真正人才。

這實在都不是用人好的辦法，正確而合理的用人標準，應該是選拔真才，要選拔真才，必須要打破關係主義的桎梏，揚棄資格主義的一部份，建立獨立的人事制度，和嚴格的考核制度，從工作中去培養人才，選拔人才，總括的說一句，用人的標準，應該以真才爲主！

抗戰以來，一切都已算進步，但是，當道的用人標準，脫去了關係主義與資格主義的

真白沒有？事實俱在，不用我們贅舉！固然，資格不能不講，可是完全以資格來衡量價值的才幹，是靠不住的；關係也未能完全拋棄，但在關係人等之中，仍應以人才爲重。

以真才爲主的用人方法，最理想的，我們以爲須「公開的征求」，「公平的甄審」，「公正的考績」，祇要把握住這三個「公」字，自然以真才爲重，「一切做桶章包」，那裏還有什麼僥倖「喫冤枉」的機會？因此，我們提出這用人的「三公」主義！

## 小公務員的生活問題

有人說：「戰後任何東西都貴起來，祇有一樣東西最便宜，那便是公務員」。這話雖近幽默，而事實確是如此。薪水減成國難薪，再減成生活費，生活費還得左一折右一扣，弄得結果是所入有限。

拉黃包車的，抬轎子的，一天賺五六元很不費事，擺個攤或提個籃賣賣瓜子花生，或是香烟水菓這種小本經營，也可掙百來塊錢一個月，至於有資本做老闆的那是紅運亨通，大發其財了。而機關裏走出來像煞蠻神氣的公務員，整日埋首案下，辛辛苦苦一月的代價，不過幾十元而已。這麼說來，公務員確是最不值錢！但是却也不能一概而論，公務員中間也有「大公務員」與「小公務員」之分，上面所說不值錢的公務員，無非是屬於「小公務員」之類，大公務員則又當別論。

苦力，小販，商人，雖然能賺得不少錢，而其畢竟還是苦力，小販，商人。坐小汽車，住別墅，吃大菜，逛窯子，畢竟還很少有他們的份兒。大公務員呢？雖然同樣受到戰事的影響，雖然薪水同樣地打折扣，可是沒有關係，小汽車還得坐，別墅還得住，大菜還得吃。

因此問題的中心落在小公務員這一方面，所謂小公務員，我們姑且以百元以下薪水做標準，這一類公務員在物價日增月漲的情況下，生活上確實大成問題。比如各機關的錄事或書記，月薪少為三十元，多則五十元，不講別的，只要家裏有一妻一子，就很難養活了。三個人吃飯住屋起碼就得五十元左右，一切雜用，添製衣服，醫藥教育等費，到那裏去找呢？如果有父母姊妹，除請到難民收容所外，別無生路，何況五十元以下的公務員還多着呢？

在「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的情形下，試問還能安心公務嗎？因之，最近各地公務員有要求加薪復薪的熱烈運動，江西已經有相當解決，就是恢復了戰前的折扣，這誠然表示當局對於中下級公務員的關切和愛護較其他各省已勝一籌。不過我們覺得這種舉措，還是不夠，還是不夠，還是不能解決小公務員的生活問題。祇是特大公務員增加一筆收入，添一項不必要的開支罷了。因為薪額愈高，恢復所得的數目愈多，反之，則所得的數目愈少，尤其各黨專書記之類，因為原薪太低，本來就無折扣，誰肯恢復？其他黨黨關係，誰能

知道這種公務員在整個公務員中是佔着絕對多數。所以這樣的補救辦法，還不是澈底的辦法。

目前是苦難的時代，整個中國浸在苦難的洪流之中，必須忍受這一階段的苦難，始能把握光明的明天，吃苦是今日中國民衆誰都應該的。但是，無論如何，吃飯問題總得解決。

在這裏筆者願貢獻一些意見，供當局採擇：

第一、全部公務員的薪額，斟酌實際情形，重行規定，最少八十元以上，最多不得超過三百元，（戰時的辦法）或者有人會拿「小公務員小窮，大公務員大窮」的論調來作反對的理由，其實仍爲烟幕，固然地位高的大公務員應酬要大，手面要闊，所以開支要巨，但是家庭生活中的吃飯，穿衣，總和小公務員差不多，如果站在戰時吃苦的觀點，那末可以不講應酬，不擺場面，至於因公的費用，自有公費報銷，所以我主張大公務員與小公務員之間的薪額，不要相差太大，而致形成大公務員，坐汽車，吃大菜，小公務員餓肚皮，流眼淚的怪現象。

第二、以公家的力量，幫助公務員實行消費合作，物價的昂貴，固有很多的因素，而奸商操縱，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推行消費合作，避免奸商的剝削，那末嘗不可以減輕一部份生活負擔。而一般小公務員大都「前吃後空」，沒有力量辦什麼合作，應運用公家

力量，扶助其創辦。

第三、對於公務員臨時發生事故，如婚、喪、病等事件，政府應規定一統一辦法，予以補助及貸金。

抗戰建國的大業，大部分落在公務員的肩上，希望當局不要忽視這個嚴重的公務員生活問題。

## 論當前人與事的脫節現象

事事離不開「人」，人人離不開「事」，這是鐵則。未有離開人的「事」，而能得到成功，也未有離開事的「人」（大眾），而能得到生活！

人與事的配合交流，創造了歷史，推動了歷史，豐富了人類的遺產（包括物質與精神），產生了若干偉人（智者與仁者）。

人與事的合理關係，應該是「人得其事」，「事得其人」，也就是「人盡其才」，「事盡其功」，人類遠大美滿的前途，和全部理想的事業，要從這種合理關係的發展中去獲取。何以故？社會的進步和事業（意味人類全部事業的發展），制度不是有着決定的作用嗎？在社會學者的眼光裏，由古代，而中古，而現代，由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必然的演進，是歷史的既成道路。換句話說，社會的進步是社會自身發展的結果，

事業發達，是事業自身發展的結果。在邏輯上說誠然不錯，但制度的本身原為人所創立，實澈制度，也必須有人的實踐。同時所以能由古代，而中古，而現代，是「人」不斷努力於「事」的結果，所以能由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就世界一般趨勢而言，中國不在此內）是「人」不斷突破舊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之結果。因為社會的自身發展，和事業的自身發展，都是以人作主要推動的因素，如果認為社會和事業的發展，是歷史的必然，可以離開人的因素，那是機械論的說法。和認為每一個國家都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級，不能由封建階級跳躍到社會階級，那樣的機械看法，是同樣的錯誤！

依上所述，人與事的合理配合，是社會進步的主要一環。理由不是很明顯嗎？說了這些嚕嚕，無非闡明人與事配合的重要，現實的情形怎樣呢？且引幾句流行語來說明，所謂「人浮於事，事浮於人」，「人人找事，事事找人」，這是不管張三李四在談到人與事的問題時都會背誦一遍。這種人事脫節的現象，在戰後尤甚。誠是：有人無事，有事無人，比比皆是，坐使興辦事業者，有四顧茫茫求人不得之慨，而不願為敵人奴役，冒險來歸之同胞，又有輾轉溝壑之懼，事業廢弛，才棄於野，忠莫大焉，至若有志及國之士，窮途思歸，久陷戰區之人脫身不得。（錄自戰時社會事業人才調劑協會緣起）人找不到事，事找不到人，這是一個脫節。有許多人所做的不是適當的事，有許多「事」所找的不是適當的「人」，這又是一個脫節。有的地方求人不到，有的地方人才過剩，這是另一個脫節！為什

麼形成這樣脫節的現象？說來語長，要而言之，其癥結可分主觀與客觀兩方面，先從主觀方面說起：

第一、等事做而不找事做——人不去找事，而要事來找人，這本來很好，因為因事擇人，才能「事得其人」。獲得真才，不過在合理的人事制度還沒有確立，各種事業百端齊舉還沒有納入正軌以前，要事來找人，同時找到「事得其人」的「人」，而達到「人得其事」，這是不可能的。因而等事做而不找事做，不是辦法。而況這裏所謂的「等事做而不找事做」，還包含對事情嫌好嫌歹的一層意思。明白些說，一方面要等事來找人，同時不好的事又不幹。有許多曾受高等教育者，抱着這種錯誤的態度，於是「畢業便是失業」；自命懷才不遇，滿口牢騷，沖天怨氣，說「社會無情，政府瞎眼」。其實呢？社會各種事業，需人正多，苦無找處。由此可見「等事做而不找事做」的擇業態度，是構成「人不到事，事找不到人」的脫節現象之主因。

第二、讀書（求學）是爲了做官——學以致仕的觀念，支配數千年來的中國智識份子，過去士大夫的畢生鑽研，白首窮經，以獵取功名富貴，固不待論。就是廢科舉以後，莘莘學子，大都還是官迷，不管學的是工程，是理科，還是什麼，一有機會，終得嘗嘗官的味兒，因此「學非所用」「用非所長」，個人覺得苦惱，事業因而廢弛。且人人都想做官，官額總是那麼多，如是你傾軋，排來擠去，弄得烏烟障氣，一踏糊塗。這是構成「有許多人

所做不是適當的事，有許多事所找不是適當的人」之脫節現象的主因。

第三、做事必須使生活舒適——一般人以為做事（就業）是為着解決生活，同時也為着使生活舒適，所以無論做什麼事情，終得問問待遇如何，待遇云云，也就是說做事所得的報酬，是不是能使其物質生活舒適？因之雖有重大意義的事，而「待遇」不好不就。不僅此也，唯其只求生活的舒適，物質的享受，做事的地方一定須在洋場十里的都會，或熱鬧繁華的城市，大家都向都會跑，向城市跑，踴在一起。熙熙攘攘，形成人才過剩，而窮鄉僻壤，或邊遠地區，縱有天大事業，天大價值，人才們也是裹足不前。這全非虛言，有事實可證，戰前江浙一帶因得天獨厚，風光綺麗，文明薈萃，所以「才子佳人」統統集中於此，在西北閉塞之區，和廣大的鄉村，除非「阿竈」誰都不願前去，等到燎原烽火，燃燒長江，揮洒血淚，退去京都，大家又都抱頭竄向西北奔命了，固然往後方轉移，是勢之當然，然而又都集中在重慶，集中在大後方各個城市，深入戰地和前線的畢竟還是少數的少數，因而成後方人才過剩。前方人才恐慌！這都是「做事必須使生活舒適」的享樂主義所使然。所以它是構成有的地方求人才不到，有的地方人才過剩」之脫節現象的主因。總括地說這種人與事的脫節是由於主觀上對服務（做事）的意義沒有認識清楚。

再談客觀方面：

第一、非關係人不用——這是以殘餘的封建意識為基礎，發展成功的個人（或宗派）主

義之作風。目前的用人普遍還是如此。一般擁有用人之權者，總是以「關係」爲第一義，「求才」爲第二義，舉辦任何事業，都是儘先任用關係人，關於這層筆者曾在論三種政治作風及確立用人標準（見東南評論第三期及第五期）二文內詳加申論。因爲講究關係，就顧不得人是否能盡其才？才是否能盡其用？事是否能得其功了？馬馬虎虎，敷衍衍衍，那麼「百端齊舉，一事無成」！有些事業感的主管人還搖首大嘆曰「天下無真才」！唯其關係是第一義，一些有「至親國戚」者，以爲反正有事可幹，樂得舒服，乃視事業如兒戲，一些「識時務的俊傑」（？）便整天忙着鑽賄購，爬狗洞，莫說做事了，其自身且嗅不可聞。至於一些「朝中無人」的先生眼見樣樣事情都非關係人不可，而自己沒有背景，只有自嘆命薄，株守井園做隱士，不再找事了，這是構成「有事無人」和「有人無事」的又一要素。

第二，不是因事擇人，而是因人設事。對於用人，應該是根據事業的需要去找尋，和徵求適當的人才。那麼用人纔算合理。事業纔能開展，而實際上剛剛相反，因爲有許多設法安插的「人」便設置了許多不必要的盪床架屋的「事」，所以這不是因事擇人，而是因人設事。這種因人設事的「人」，既是沒法安插，也就等於多餘（其實人是沒有多餘，此處不過就其對某種事不適當的意義而言。）多餘的人，還談得什麼人才？既不是人才，那里還談得到成功事業？不能成功事業，在社會方面是一種損失，在個人方面，是一種痛苦，這是構成「事不得人」和「人不得事」的要素。

第三、事業的發展太偏重一隅——目前是民族主義昂揚的時代，一切事業的興建，都以民族爲至上，和全民族爲依歸，也就是說事業的發展，應普遍到整個民族的全都領域，以使各地文化有平衡的進展，如果保持這個原則，那麼人才能夠散佈在各個角落里活動，更加推動了這個進展的平衡性，但過去的情形不然，多數事業是建立在和中央鄰近的省份，（固然是因爲地理和人力上的關係）因此多數人才也都集中在這裏。邊遠區域要想求才，真是萬難，而有很多人，寧可在上海住亭子間，靠賣文得來的錢，吃大餅過活，却不願到邊遠區域去任大事，所以「事業的發展太偏重一隅」是構成「人才過剩」和「人才恐慌」的又一要素。

總括地講，這種人與事的脫節，是由於客觀上對人與事之間缺乏一種有力的調劑！對人與事，脫節現象，和其主觀客觀的原因，已加分析，究竟怎樣克服這個脫節現象呢！關於這個問題，筆若當另行爲文以貢一得之想。

## 漫論前方與後方

「一邊是嚴正與工作，一邊是荒淫與無恥！」

在任何一個時間，任何一個空間內，似乎都有這樣的現象存在着，這是不是由於矛盾統一的支配？我不懂唯物論辯證法，無從知道。

抗戰的洪流，向每一個角落傾瀉，於是許多直接對敵的敵人展開英勇搏鬥的地方，便變成了前方；離開戰鬥火線較遠的地方，便是所謂後方。本來，戰爭是主體的，抗戰是全體的，無論前方或後方，都在戰爭空氣的控制之下，前後方該是有機底配合和統一在戰爭底需要以下，健全後方，才能穩住前方；鞏固前方，才能安定後方！

然而，事實並不盡然。在前方，從酷寒的嚴冬，到熾暑的炎夏，抗戰將士在冰雪的涼野，忍受着飢寒，把生命貢獻；在七月的火熱太陽暴曬中，流着巨量的汗，重量的汗。戰地民衆，受着恥辱與仇恨，在苦難中掙扎，把痛苦付與鬥爭，這幅圖景，是艱苦與偉大的整個結構。

後方呢？民衆的動員，兵役的補充，不能說成績不好，而在壞的傾向方面，也相反的發展起來。昇平歌舞，酒綠燈紅，享樂的狂潮，泛濫在每個城市，戲院，劇場，夜夜掛牌客滿，酒餐飽，飲浴室朝應接不暇，並且還有某些掌握着全省文化，經濟心臟的號稱，離敵人的火線也不算遙遠，而一切社會的反應，却與抗戰風馬牛不相及，離開抗建的要求，半萬公里，除去牆上的大字標語，和救亡團體的救亡戲，以及「救亡專家」的救亡口號，別的再也嗅不到抗戰的息氣。然則「清唱館」之類是欣欣向榮的盛行起來，同時不還是清唱館已，什麼「羣芳會」，什麼「公娼」等等的名堂，在極低級的趣味和不正常的誘惑之下，犧牲了多少公務人員和一般青年的寶貴時間？許多人讓色情薰閉了良心，逃開抗建的陣線，非心

誰說精神總動員推行不徹底？國民月會號召了廣大的羣衆參加，上臺演說的，亦莊亦嚴，又激又昂，但是回家後八圈衛生麻將，也是常事。

節約運動，雷厲風行，一滴汽油一滴血，而摩登太太，時髦小姐，坐着流線型汽車招搖過市；大人先生，公子哥兒盛大闊綽的宴會，並不稀奇！這些種種確是畸形的可慮的現象。

政治跟不上軍事，後方配不上前方，這是三年抗戰經驗給予我們的痛苦教訓，勝利的光明，固然要歌頌，潛伏的黑暗，更不能隱瞞，因為檢討自己，就是克制敵人。

後方與前方脫節，等於是折斷自己戲臺上的一部份臺脚，再上臺唱戲，一不小心，就要跌下臺來，這對於抗建前途，確是非同小可。要克服這個脫節，應從強化每個人的生活戰鬥性做起，目前是戰鬥時代，世界在戰鬥中，中國在戰鬥中，中華兒女更是在戰鬥中，戰鬥的特徵是嚴肅，緊張，確實，必須使每個人的公私生活合乎緊張，合乎確實，那末才能配合戰鬥時代戰鬥脈搏的跳躍，才能使前方與後方有機底統一起來，才能獲取這戰鬥時代之戰鬥的最後勝利！

七月廿一號晚

## 貪污新論

政治之不上軌道，主要的在於貪污的未能肅清，貪污的種類和方式很多，但大別之可

分二類，一是揩油，一是受賄；所謂揩油，是從其職務範圍以內作經濟舞弊，如偽造報銷，刻扣薪餉，吞吃經費等等，數目雖有多少，事態雖有輕重，而其揩油則一，所謂受賄，則係利用其職位向外擄取，如賄委官吏，賄了案件，賄縱烟賭賊盜等等，方式雖各不同，性質雖各有異，其受賄則一也。不管揩油與受賄其最終目的都在獲得額外之財，以供個人之物質享受，因為貪污之風仍未全煞，所以通常大家把「升官」發財」連在一起。抗戰以後，肅清貪污的運動日益高漲，一些貪污土劣，性命交關，於是窮則變，變則通，貪污的方  
法與技能更爲高明了，以另一種新的巧妙的姿態出現，這便是「挪用公款，經營商業。」

每一個機關都有它的經常經費和準備經費，這些高明的貪污先生，便把這些有餘的公款，名義上存入有關係的銀行，而實際上則暗中提出來做生意，屯積操縱，不多久，便可  
利市數倍，如果結算賬目或遇上級機關查賬，則馬上把公款補足，或將貨物押入銀行，這  
樣便天衣無縫，毫無問題。

最近，監察院巡迴監察團，便在某省發覺一個很大的挪用公款經營商業案件，聽說已  
提起彈劾。如果是真的，那末我們一方面覺得高興，一方面覺得痛心，高興的是貪污者終  
必落網，痛心的倡政府宣佈明令，嚴禁公務員兼營商業，而却有人在挪用公款，大做起盤  
斷居奇的勾當。

我們希望當局不要忽視此種案件的嚴重性，必須盡法以懲，因為關係到中國政治前途

甚巨啊！

## 五月論

血紅的榴花，象徵着五月的到來，五月是偉大的，在人類解放的意義上，掀起過無數次革命的高潮；「五一」是世界勞動者爲要求改善生存，而向剝削階級進行總反抗的一天，從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的權利，而引起全世界勞動者的自覺；這個偉大的紀念日，與中國却沒有直接關係，因爲中國的產業落後，階級沒有形成，勞資的關係自然也談不到尖銳對立，不過其對於改善勞動者待遇上，影響還是不小。而此外的「三二」、「五四」、「五五」、「五九」、「五一九」、「五卅」、「五卅一」各紀念日，則都是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所爲成。「五三」濟南慘案發生在民國十三年，是日本強盜眼見着中國革命力量膨脹，而進行阻撓革命統一的陰謀之總暴露。

「五卅」是中國運動的發源之時在民國八年，由於北平學生堅強的反帝反封建之行動，展開一個廣泛的運動，而運動此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放射着永遠不滅的奇異光輝。因爲不僅促進了政府的改革，並且打開文化上新的路向，盡了歷史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

「五五」有兩個紀念，一是民國十年革命政府的成立，這天國父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革命政府就是目前國民政府的前身，因此可說「五五」是奠定中國政治基礎的「五月」。另

一個紀念是上海停戰協定，「一二八」淞滬戰役，我們雖節節獲得勝利，但因種種牽制不得不簽定屈辱的停戰協定。「五九」國恥紀念，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奇恥大辱，毒辣的二十一條條約，於民國三年五月九日在袁賊皇帝夢之下俯首接受。這是開日寇後來步步侵迫的先河。「五卅」慘案，是日商紗廠虐待華工所引起，這一次大流血，顯示了中華民族勞動階層正義戰與民族意識的濃烈。此外還有「五·二九」何梅協定，「五·卅」塘沽協定，都是日寇的侵略血債。

我們敘述了上面一連串五月的史實，可知整個五月是浸在黑暗與光明，正義與野蠻的交織鬥爭之中，所以有人名之為「血的五月」「革命的五月」，這固然能顯示五月的偉大性，但我以為這種象徵，還不夠具體，不夠明瞭，沒有抓住五月的全部意義，我認爲五月中不斷掀起的革命，是爲了爭取民族的獨立，民權的獲得，和民生的改善，因此五月的革命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五月所流的大量鮮血，是爲着實踐三民主義而流。具體的講，「五一」在爭取民生主義之實現，「五四」「五五」在爭取民權主義之實現，「五三」「五九」「五·二九」，「五·卅」「五·卅一」則全是在爭取民族主義之實現。這樣我們把五月叫做「三民主義的五月」，是非常正確，非常有根據的！

三民主義的五月，我們不能輕輕放過，但也不是年年照舊舉行紀念儀式，開一下會就算是把握住五月，我們必須站在三民主義之革命的意義上，去了解五月，把握五月。

第一、消滅反革命者的蠢動。革命與反革命的陣營非常明顯。在今日，不信仰三民主義，其行動必然就是反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為革命準則，那麼反三民主義就是反革命。馮軒汪精衛和一些別具陰謀的野心家流，就是反革命的代表，他們正利用日寇和其他帝國主義，進行大規模破壞革命勢力的蠢動。每個三民主義的信仰者，不應一刻放鬆當面的敵人，而隨時運用理論與行動的武器去消滅革命叛逆。

第二、打擊不革命者的蠢動。有一些學者名流，自視清高與超然，對於革命在觀望猶豫態度，想做個既不參加革命，也不阻礙革命的中間份子，其實不革命與阻礙革命，在革命與革命之間，不允許有不革命的忠立者在。在因循不參加革命，就是削弱了革命力量，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豈不是反革命嗎？現在，我們要展開一個無黨無派份子的運動，隨時準備着與不革命者鬥爭，乃至予以無情的打擊，用鬥爭與打擊，剋服其觀望與猶豫，爭取其轉向革命陣營。

第三、消滅偽革命者的混跡。反革命與不革命者，一睜着若就可明。但是我們的敵人，在唯有假革命者不易發覺。其狡猾的舞動，且這種狡猾的假革命份子，在印民主義的傳播中，還潛伏很多。他們有的是封建階級，有的是新官僚軍閥，以種種虛偽來欺誑，以收招攬。迎的姿態出現。滿口三民主義，滿口革命，其行動則處處與革命對立。其目的在於消滅假革命者的混跡。我們的革命堡壘，在其腐蝕之下，而受其毒害。反革命對於革命者，

公然阻撓革命更爲猛烈。今天，我們再不能容忍，應該澈底的清算，揭穿他們做假革命的醜態，對他們滾出去！

如果能夠把握住以上三個方向去努力，那末對於偉大的民族主義五月潮，更緊要的措施

三〇五·於炳申

## 革 命 論

### ——肅清腐化惡化與培養優秀幹部——

由於幾十年國民革命的實踐，事實告訴我們民主主義無比的正確性與偉大性，它代表全民族各階級和階級的理論觀點，指出人類在生存向上的過程中，所發生斷絕的整個具體解決方法，因此，歷史也寫定了唯有執行這個崇高理論的國民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才能完成中國革命和歷史任務。

革命尚未成功，艱巨繁雜的對比抗戰，是國民黨革命必經的階段，無疑是這偉大的抗戰領導責任中祇有由國民黨負責起來。

誰都知道，我們這次抗戰的成敗，不僅關係中華民族的存亡，更關係整個世界民族對

和平，所以，負責領導抗戰的本黨，是樹立世界和平的革命先鋒。這個革命堡壘的是否健全，不僅與中華民族息息相關，更與全世界有莫大影響！

「建國必先健黨」是事實上的真理，健黨是當前最迫切的工作，因為「抗戰、建國、與健黨」是不可分割的一環！

(二)

以一個正確主義和悠久奮鬥歷史的國民黨，理應基礎鞏固機構健全了，但，事實上不能否認，還有許多部份的缺點存在着，這種缺點的存在，不是政綱政策的不適當，不是政治路線的不正確，更不是制度上的問題；而是純粹「人」的問題是黨員質素的不健全，明白一些說，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一部份毫無革命信念的投機份子，混入革命堡壘，從中把持操縱起一種腐蝕的作用所致。

本來，在每一個革命轉變時期，投機份子的混跡，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中國這樣久停滯在封建勢力的社會條件，經過革命力量的掃蕩，一般封建殘餘，和軍閥卵翼下的新官僚新士劣，很快的會抓住革命尾巴投進革命營壘，然而革命工作是世間最艱苦最不易成功的事業，完全是「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和「我為人人」的利他主義行動的最高表現在革命的投機者是永遠不會了解這些，他們一朝得有機會便是一假革命之名，以行肥私之實，很多腐化的黨員和貪污官吏，口口聲聲奉行三民主義，而實際上正在幹着違犯三民主義

的勾當；民生主義中明明白白指出要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他們却偏偏在剝削民衆，吸取民衆血汗；黨的領導者三令五申的要每個黨員廉潔從政，而他們偏偏在貪污，在大發國難財。

因之，國民黨的領導力量，因內部少數腐化惡化份子的對消而降低，竟因了這少數腐化惡化份子的行動表現，招致了過去全國人民對國民黨的誤會與抨議。

這種痛心的現象，確曾阻止了中國革命發展的相當歷程，所以 蔣總裁屢次大聲疾呼，底要來一次澈底的清黨運動。以澈底掃除這批投機者的混跡和貪官污吏的賣身投靠。

偉大的歷史任務擺在國民黨肩上，這個革命營壘再不容有投機者的竊居，要完成後期革命的任務，必先健全黨的基礎，充實黨的力量，然後領導全國民衆爭求實現。而要健全黨的本身，必先清算腐化惡化和貪官污吏。目前中央對淘汰腐化分子層雖嚴令執行，我們還希望特別強調這一工作。

第一，嚴密切實運用監察制度；雖然，在黨的方面，有各級監委會的設置，政方面有監察院的設立，但是我們檢討過去的監察工作，制度既不夠嚴密，也沒有切實地運用，這一點，對於腐化惡化和貪污份子的能夠長期投機混跡不無關係，今後我們必須嚴密切實運用監察制度，使腐化惡化無法立足。

黨部以鼓勵黨員檢舉黨員中的腐化惡化份子，除由黨部加以考核和調查外，並儘量鼓勵每個黨員互相檢舉，尤其是注意檢舉從政的黨員。

第四、用非常手段制裁腐化惡化及一般腐化惡化和貪污份子，決不姑息，決不寬貸。橫行貪污，手段定很巧妙，如果以法律眼光去懲罰他們，決不容易，所以凡經黨員或他人檢舉，由上級黨部查明屬實，即以最嚴厲的制裁加于他們，可以不需要法律上的證據。

第四、加強調查工作，用秘密的方式，去調查那些腐化惡化和貪污份子，以便徹底肅清。調查工作，國民黨早已進行，現在更須把它加強和擴大。

務必使國民黨的革命營壘中沒有一個腐化惡化的存在，並使國民黨清下的各級黨部組織中，沒有一個貪污的存在，使國民黨每個黨員都成為堅強的革命鬥士，並使國民黨治下的每個公務員真正成為人民公忠之僕。

(四) 培養幹部所以充實革命力量

一個革命的黨，其重要者，是黨的組織和健全的機構，並須具備巨大的力量，以作革命事業的推動，國民黨要荷抗建的重任，自須不斷的充實革命力量，而幹部是力量的源泉，要充實力量必須從培養幹部着手。而且肅清腐化惡化與培養優秀幹部有不可分性，惟其掃除腐化惡化，纔能夠提拔新進的優秀幹部，纔能夠淘汰腐化的腐化惡化。

「幹部決定工作」確有其相對的真理意義，「幹部即是力量」也不是過火之言，不在有範圍

民黨的「幹部荒」還沒有解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幹部不是天生的，幹部也不是特殊的天才，簡單得很，幹部祇是從工作中培養和提煉出來。中國黨黨沒有幹部？為什麼各級機構和各種工作部門中，都普遍的鬧着幹部荒？

這理由也很簡單，主要祇是因爲各級領導者和負責人員沒有注意幹部的培養和提煉。

我們檢討過去培養幹部的態度和方法，認爲不是挺正確的，例如因爲某種需要，於是臨渴掘井開了一個某某幹部訓練班，招收一些根本與某種工作不相關的人，加以短時間的訓練，結訓後便分派他們去擔任某種工作的中級或下級幹部了，試問這種幹部是不是能真正負起幹部的使命。完成幹部的使命。這是個疑問。（筆者的意思，並不是反對開辦訓練班，相反的是贊成在戰時多開辦訓練班，此處祇是對培養幹部的方式，一種檢討而已）

我們培養幹部，必須從平日工作中着眼，才有出路。

第一、根據能力分配工作，大才小用，或者無才重負，都是限制黨黨表現出幹部培養的積極性。黨黨的主觀能力，分配適當的工作，纔可使他盡量發揮和運用工作能力，鍛鍊並增強其工作能力。

第二、根據工作考核成效，考核工作成效，不僅是考核領導者的情動，而且必須考核其進行工作的態度和方法，工作之結果和功效，以便針對着他的缺點，加以糾正和指

導。

第三、以教育代替督促：各級領導者須以教育的方式推動部屬工作，使每一個工作者都在工作中學習，學習中工作，祇有平日在工作中不斷的予工作者以訓練，才能培養出良好的工作幹部。

第四、以推薦提拔代替妬嫉排擠：各級領導者根據考核，對有才幹和能力的，必須提拔推薦，使其負更重的工作使命，以打破向來非私人不薦拔，非私人即妬嫉排擠的壞作風。以上講的是從工作中培養幹部的幾個原則方式，但在培養之前有幾個大前提必須注意：

第一、務使有能力者都獲得工作機會。幹部須從工作中培養出來，如果許多有能力的未能獲得工作機會，那麼一輩子也沒有好的幹部產生，所以務使有能力者都獲得工作。

第二、幹部對象須着重於青年方面：青年學習和接受的精神特別強，最容易培養為良好的幹部。因此，培養的對象似應着重於青年方面。

第三、使全國各階層的优秀份子加入國民黨，使成為國民黨有力的生命細胞，然而再培養成爲有力的革命幹部。

總結起來，以上所說的鞏固革命堡壘與充實革命力量兩點，國民黨正在以最大的努力，着手進行着，抗建的前途是光明的，革命的成功已不在遠了。

——完——

## 第二編

### 二重人格論

「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我們到處都可以聽得到這樣的話，其實這句話不通，不合邏輯。因為「事實產生理論，又由理論指導事實」，事實是理論的根據。理論是事實的南針。理論與事實有相互影響作用，並且相互配合而統一着。除非是歪曲之論，而不是真正的理論，那麼其理論都有實在性，都包含有事實在裏面。換句話說，在理論上說得通，在事實上就該做得通，所以理論與事實，不可分割。

然而不明白這個道理，把理論看成是一件事，把事實看成又是一件事，還大有人在。淵源於這種錯誤的認識，表現於個人方面，便發生了二種人格，所說二種人格，就是指「某一個人口言」和「一行」的不相符合，講的理論和做的事情完全互反。一些人滿口講的是「仁義道德」而實際幹的都是「男盜女娼」，一天到晚「革命」不離嘴，按其行動則是在進行「反革命」的勾當。一些人高喊到前方去，到戰地去，到敵後去，而自己却沒命向後方跑，往西北鑽，大聲疾呼要節約，要束緊褲帶要禁止奢侈品入口，而自己却吃西餐，坐汽車，替太太買五十元一瓶的巴黎香水。

還有「大發」國難財，說要肅清貪污，而其自己却在「公開」的大做「國難官」，「秘密」的大做生意，大肆操縱。

更有一些人，發出皇皇命令，禁賭禁娼，絕不寬容，日夜捉拿，像煞認真，而把捉回來的麻將，撲克，拿到公館晚上或禮拜天，和同僚坐下來，「東南西北風」和「我A你B」，你老風，「莊」字里，土娼家，也得不時光顧。這些等等不勝枚舉的仁人君子都可以舉二種人格之事實的具體說明。

第一種人是以漂亮的口號，好聽的名詞，遮蓋人的耳目，掩護其罪惡的行爲，雖是一罪大惡極，但表面上還不失爲「道德先生」，雖是「背叛革命」，但表面還不失「熱心革命」。這是欺世盜名的妙策！

第二種人，是要人家都去死，都去死在沙場，而自己却要活，更要活在舒服的後方；人家都儘量吃苦，儘量的餓肚皮，自己却要豐衣足食，要享樂要講究。人家去沙場死了，儘量吃苦了，與他沒關係，況且是自己的提倡，假如與抗建有幫助，反正功勞還在自己。這是名利雙收如意算盤！

第三種人，是以「嚴肅貪污」爲大勢所趨，應該如此，所以不得不說；「禁止兼營商業」是於於命令，服從第一，所以不得不說；而「國難官」爲權力所在，也不得不爭，「

國難財也為機會所在，他也不得不取。一做生意一為利益所在，更不得不做。而況大談一談，貪食同仁，大談一談，嚴禁營業，一可使社會盡人共知，而大發國難財，大做生意，却是絕對秘密，無人知曉，這是識時務，懂機變的把戲。

第四種人，以捉賭捉，是為着執行法令，至於自己公館里，又麻將，打撲克，那是「公館消遣」，逛賭場，則為「偶一為之」，如此這般，就是所謂「祇能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

以上四種人，不過是舉例說明而已，二重人格的事實，多如牛毛，無法細舉。

這種二重人格的人比什麼人都可惡，漢奸、反動、強盜、烏龜、王八、賊、都比較容易看出它的本色，唯有這種具有二重人格者不容易看出牠是什麼傢伙，因為它如，一牆頭草，風吹兩邊倒，你說他不革命，他却口口聲聲大叫革命，你說他是貪官污吏，他却也高喊滿清貪污，你說他沒有熱情，不負責任，他却又似乎頗有熱情，很負責任，但一遇到狐羆狗黨，却又原形畢露，在進行反革命，貪污和放棄責任的勾當了。因此，這種人等於「游魂」，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游來游去，等於「戲子」，在政治舞台上混來混去，很難摸對他的頭腦，看准他的面目，根據這種分析，可以說二重人格是成功事業的障礙，社會進步的阻力和革命的障礙。

要使事業成功，使社會進步，使革命勝利，必須澈底打破這二重人格，如何打破呢？

便是：

第一，實踐。國父「誠的哲學」：形成二重人格的第一個因素，是由於「不誠」；誠的反面就是虛偽，虛偽就是不說老實話，不做老實事，也就是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事，「誠」是世界上成功一切事業的基本，所謂「不誠無物」所謂「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國父孫先生對「誠」非常看重，所以說：「天下之達道三，民族也，民權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也，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覓軍人精神教育」國父對「誠」的重要已指示得非常明白，而且所謂擇善固執就是誠人的最高運用，易言之，就是我們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就應堅定不移地奉行不渝而勇往直前，不能朝三暮四，動搖不定，如果能實踐「誠」的道理。而達到誠於中，形於外，那麼就可表裏一致，而克服二重人格了。

第二，實踐。國父知難行易暨蔣委員長力行者學，形成二重人格的第二個因素，是由於中了知易行難的毒而沒有力行之故，因為覺得知是易，行却難，所以只是一坐而言，而不一起而行，並且所行與所言適巧相反。因為只是講空話，而不去力行，於是其行動和言論相去更遠，結果變成言論是言論，行動是行動，國父提倡「知難行易」，含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能知必能行」，一層是「不知亦能行」，這就是說「講了就做」，「能

知必能行——做了再講——不知亦能行——假如這樣，那末就可言行相符，不致發生「言不顧行」的言行相離言行的土重人格。

將委員長以爲人生就是力行，力行就是人生，歷史就是力行，力行就是歷史，力行對於人生和歷史有莫大作用。他說：「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力行的範圍，可以說凡是存在的中間成長。」及「不論上智的安而行之，不論是養性精微的勉強行之，祇要我們由力行而增進我們利他的本能，祇要我們讓純粹之永不退讓，那就可能達到我們人生「行」的目的，而且這種行是必容易成長的。」又說「在人類全生活中，凡是生存與發展，以及某階級與階級的銜接，後一段與前一段之間的準備補充，及無不是行。我們經常生活的寢息食作，都可以包括於行的範圍內，行的意義是不分動靜的。」觀乎此，我們就可瞭然力行的重要了，假如明白了解，將委員長的力行哲學，把人生過程看作是力行過程，而且力行的目標是利他，那末絕對不會發生二重人格！

二重人格比毒蛇猛獸還利害，我們必須澈底予以打破使其紛粹在「誠」與「力行哲學」的下面。

### 二種人論

——天才，人才，與奴才——



這種人沒有主見，沒有骨頭，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然而唯其他是處處圓滑，面面俱到，因此他却一步一趨，爬上去了，並且在他底下，植了一大批的小奴才出來。

上面三等，比較起來，當然人人想做天才，但是天才自己沒有法強求，要靠娘和爺，甚至十八代老烈宗的爭氣，能夠遺傳下來天才的種子，吾則毫無辦法，而人才則是那麼困難，並且還得不到好出路，拚死拚命的去爭做一個人才，那又何苦來哉？祇有奴才最容易而且最討便宜，難怪現社會裏到處充滿着奴才了！

一九四一秋於太和

## 想入非非

我常常躺在床上到很深的夜間裏還睡不着覺，睜大着兩只眼睛，墨黑中直盯着帳頂或者板壁，腦子裏亂糟糟的想一些不必要的問題，翻一個身想一件事，越想想越多，越想想越麻煩，而且越想越糊塗，想來想去，弄得頭昏腦脹，結果還是想不透：——

自己沒有做官的時候，說官如戲場，實在沒有意思；做官的沒有好人，怎樣卑污，怎樣醜惡；如何括地皮，如何討姨太太，如何勢利相，如何搭架子，直把做官的人，罵得狗血淋頭，一文不值。自己而在席地裏卻是又憤憤不平，躍躍欲試，想嘗嘗官的味道，於是東奔西走，活動，假如一旦找着了路子，爬上了台，真正的做了官，那末耀武揚威，神



一步一步着實不容易，傲倖成功了，才能訂婚結婚。

結了婚的人，皺皺眉頭唉聲嘆氣，把老婆柴呀，米呀的噁噁咕咕弄昏了頭，孩子的尿呀，屎呀，擾得滿肚皮的火，一不高興夫妻們吵吵鬧鬧，是家常便飯，他對一般沒結婚的青年份子，自由自在的生活真是羨慕不置，「這個年頭，光身漢該多快樂」？

越想越遠，越想越那個？反正是想入非非，想不透也就算了。

三十，八，秋夜

## 想 想 自 己

好像託爾斯泰會說過這樣的話：「人類之進步，不在真理的發掘，而在如何揭去人與人之間虛偽的外衣，獻出真實的感情」。（手頭無書，大意如此）的確，世界上的熙熙攘攘，是是非非，以我看主要的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的虛偽所造成。

到了今天，社會上還是儘有許多偽君子，套着一副假面具，招搖過市，橫衝直撞，表面上口口聲聲仁義道德，骨子裏實實在在男盜女娼，它的兩副臉孔，一副是騙人家，一副則是騙自己，對人家，擺出道貌學然的架子，打打官腔，說說漂亮話，喊喊革命，叫叫救國，於是肉麻當有趣，飄飄然起來了。對自己呢？打幾圈衛生麻將，是消遣消遣，無路道

理；嫖堂子是逢場作喜也沒甚關係，公款裏頭揩點油，區區之數，馬馬虎虎算了；這樣一想，萬事如意，自己的事，只要人家不知道。君子還不失爲君子啊！

因爲不僅能騙人，而且能騙自己，工夫便到了家。真正做到「忘我」的境地，把自己忘得乾乾淨淨，相當於佛家的「色卽了空，空卽是色」了。它對人對己，就比如觀音大士，騰雲駕霧凌空的向下觀看，見到了醜醜醜醜，於是口唸善哉善哉，「南無阿彌陀佛」，這就等於我們的君子先生對人家會裝腔作勢叫大聲疾呼，指東說西，大發其批評議論一樣。

把自己丟在一邊，專找大家的毛病，吹毛求疵，無中生有，今天批評張三，明天批評李四，說來說去，人家千差萬差，只有他自己才是十全十美不折不扣的完人。

社會上一切的紛擾，實在是要這批忘記了自己的人所惹出來，也就是說，披了騙人騙己的虛僞外衣者是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假如個個人都能先看看自己，（把自己看清楚）再看看別人，那末就不致於專門找人家的麻煩，所謂推己及人不要一味放縱自己，苛刻別人，惹出許多的是非來了，所以我認爲還是少說說別人，多想想自己吧！

於秦和

## 第三編

### 把握主題

有些人爲着反對「抗戰入股」反對「差不多化」，因而在其作品中儘量避免涉及抗戰；人家寫過的題材，自己也就不再寫，像煞非如此，就不免被人目之爲「入股」或「差不多」先生了。在這個風氣之下，許多作者丟棄了「殺呀，衝呀，血呀，汗呀」的呼喊，而代以私人情感的發洩和身邊瑣事的抒寫。

我們知道文學的任務是刻畫時代，傳播時代的心聲，作爲推動時代前進的核心和先導力量，它當然應該和時代脈搏的跳躍緊緊呼應。

當面的現實夠偉大了，戰爭的烽火燃遍地球的各個角落，從亞洲，歐洲，到非洲，民族革命的火燄，人類解放的火燄，強暴者的侵略火燄，熊熊的燒成一團，織成火網的世界；從太平洋，大西洋，到地中海，黑海，波羅的海，弱小者的反抗怒潮，兇橫者的屠殺血潮，掀起滔天巨浪！在這血肉淋漓的現實下，我們的寫作，還應該以發洩私人感情和抒寫身邊瑣事引爲滿足嗎？這是太缺乏正視現實的勇氣啊！

不錯，在過去的許多作品中，把現實的題材，表現成公式化，定型化，因而削弱了作

品的效果，但，這還是由於作者寫作技巧和生生活體驗的問題，不是題材選擇的問題。假如因為表現的不夠深刻，和運用形式的不夠多樣，就拋棄，與當而現實相聯的題材，這是犯了因噎廢食的錯誤。

我們既生在這一個時間（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和這一個空間（抵抗日寇侵略而戰爭的空間）就必須緊緊把握這一時空所要求的主题，就時間的要求言，我們的基本主题是反侵略；反強暴，就空間的要求言，則是抗戰建國，把握着這個基本主题，去覓取與這主题一切有關的題材，從而通過藝術手腕，以各種各樣的姿態和形式表現。這樣絕不是一八股化，或「差不多化」，一些拼命避免涉及抗戰而死鑽牛角尖的先生，可以壯壯胆了。

## 閒話少說

：翻開報紙雜誌常常會看到「××閒話」，「××閒談」，「××閒筆」，「閒話××」以及「閒事閒談」等等的文章，拜讀一下內容，有些的確是名符其實，講講不關痛癢，沒有意思的「閒話」；有些却也儘多憂世憤時慨乎之言，或者意味深長的諷刺幽默話。前者是「名正言順」也就不去說它了；而後者却有些使我疑惑。既是「言之有物，持之成理」，當然一定是有意識性和目的性的，那又何必標明是「閒話」呢？

所謂「閒話」照其本義上講，就是多餘的話，沒有作用的話，說你不妨儘管說，而別人

則是可聽可不聽，並且「閒話」應該說給「閒人」（無事的人）聽；「忙人」（有事的人）那就「受之有愧」，「不敢做聲」。

本來「有閒階級」吃飽飯沒事做，寫些「有閒文章」說些「閒話」，消遣消聊，天說開開心，把日子混過去，這是「閒文」和「閒話」的來源。

同時「有閒階級」單靠自己寫寫「閒文」說說「閒話」，其「有閒」生活還感不夠充實。於是請一批「閒客」，搖旗吶喊，助長聲勢，這便產生了「幫閒階級」。君不覺過去在文壇上還有所謂「幫閒文學」嗎？

想不到在大家都忙得要命的今天，又有些人却以「閒人」自居，說些並非閒話的「閒話」。大概是由於時代的進步吧？

其實，閒話也不容易說，譬如易君左幾句閒話，揚州人和他爭訟不休，幾幾乎吃官司。在目前抗戰建國時代，大家都在嚴肅緊張，熱烈中生活，有什麼話不妨大膽直說，不必情願發揮說什麼「閒話」，假如一定要說，那麼保準沒有人高興聽，何況說「閒話」也是件難事呢？因此還是少說閒話為妙。

## 「新風月」的沒落

表現在文學上的風花雪月，是極端個人主義的浪漫主義之傾向，這種傾向在中國隨着

鴛鴦蝴蝶與禮拜六派的沒落，已早被時代所奧伏赫變了。

所謂風花雪月，不僅是指吟風弄月，賞雪玩花的頹廢或享樂的作品，一切隔離現實的無病呻吟，都可屬於這一範疇。

一些人之所以會走上風月派的道路，是由生活與現實的脫節，思想的與時代前進不相配合，個人感情與歷史感情不相容之故。雖然明顯的已被時代所拋棄，做了時代的尾巴，但由於士大夫意識的作祟，却仍不甘寂寞，做其主宰象牙之官的美夢。於是便產生了以個人為中心以發洩為目的的風月作品。

在過去的風月作品中，多半帶有極濃烈的浪漫的氣息。當然浪漫在文學上並不是絕對有損的事，相反的，浪漫在中世紀的文學發展上，曾有極大的革命作用。誰都知道海涅與拜倫是浪漫主義作家，但其作品的偉大性，並不因浪漫而減損絲毫，這是因為海涅與拜倫有着豐富的人生體味與生活經驗，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和參加現實搏鬥的精神，故其浪漫是有着社會意義的浪漫，是集團主義的浪漫主義。這與風月派的純個人的浪漫主義完全不同。

自九七八以後，中國民族踏入警覺階段，一切歷史的渣滓在大時代洪流的衝激下，失去其存在的可能性，當然風月派也不能避免被清算的命運，所以都偷偷的隱匿起來了。

但，到了經過四長年抗戰的今天，却從許多作品中，看到風月派復活的傾向，這種復活是有性質的轉化，而以另一種新的姿態出現，這就是所談的新風花雪月。

新式風月與過去不同之點，主要在表現的手法方面，其在抒寫某一種情緒或事件時，生硬的拉到抗戰建國上去。所以人的印象則是與抗戰建國無關。與過去相同之點，則為都是以私人為中心。每產生的作品無非是私人感情的發洩或生活上的閒事之敘述等。這樣新式風月給人的影響，會使人隔離現實。因此，早有人提起文壇的注意，請不要讓新式風月在今日滋長蔓延。

雖然然而却有人公然為新式風月辯護，認為風月文章在某種時空和場合，有其運用的價值。這種觀點，十分錯誤。上面已經說過，寫風月文章的人，是脫離了現實，背棄了時代，在爭取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的今日中國，不諱是不需要離現實和背棄時代的文章，就是不參加抗戰建國不現實的人，也絕不容許其存在的。

## 靈 感 論

而迎着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在大時代急流的漩渦中，對於寫作上的靈敏問題，似乎再沒有提出討論的必要。然而有一些人常常喊着沒有題材，寫不出文章，或者說心中空空如也，或寫些什麼呢？並且以抗戰期間的抗戰刊物上，風起雲湧，確有靈敏一詞之概，編輯先生大施其拉稿手腕，以這些「作者」要化入社之類，像煞是應接不暇。於是急印正作，怕啦呀，心坎不佳啦，這沒有好的材料啦，這一套回住編輯先生。這些等等，都是或明或

暗的表示着，因為沒有靈感，所以寫不出東西。

，無疑的，靈感在寫作的過程中，是重要的一環。尤其是文學創作，但是對靈感的正確理解，不是如喊着沒有靈感寫不出文章的人那樣把靈感看成是可以突然而來，或者可以等待得來，同時靈感更不是如中國神話中的佛家歷十時中必血來滿山那樣神秘的東西。關於靈感的本質，及其在寫作上的重要性，俄羅斯詩人普希金說得很對：「靈感潛於乃心靈之敏捷的領受印象，適應概念，從而是一切的說明；靈感之其在詩上的需要，就如在幾何學上之需要一樣。」（拍格尼依（D. Paganini）也說：「我以為依鑑別的工作，是從不會完結的。靈感者，只是鑑別之所謂最銳利的啟發，說明，靈感者，是思想之最高的別種限度的清醒」。因此，必須通過現實的生活經驗，以高度的熱情，謹慎底吸取和鑑別印象，這種鑄儲才是靈感，明乎此，可知等特靈感來時寫作，和寫作時的否定靈感，都是偏見，一樣底犯了錯誤。還有公些人，所謂空想的靈感論者，認為沒有靈感的時候寫不出文章，而如果有靈感，便可單憑這一點靈感，寫出成功而完美的作品，這里所謂單憑靈感的意見，是否定了靈感須通過藝術技巧才能完成作品，這也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在寫作活動的領域內，應該是把握住對靈感的正確理解，從而努力靈感的創造和獲取。在努力靈感的獲取中，必須努力藝術技巧的鍛煉，祇有一方獲取真正靈感，一方鍛煉藝術技巧交織的勞力，才是寫作的正確態度。

靈感獲取的過程，也就是勞動的過程。必須是有如高爾基所說：「無論是科學或文學，其中占着基礎的工作者，都是觀察、比較、研究，藝術家與學者一樣，他須有藉想像及藉解謎的直觀二者來把握一切的那種力量」，這種觀察、比較、研究，便是勞動，如果沒有韌性的勞動，和豐富而高度的抓住現實，抓住生活的熱情，那末靈感是永遠臨不到頭上，關於前者（指勞動）法國文藝巨匠巴爾扎克說的好：「不息的勞作之爲藝術的法則，且如它之爲生存的法則一樣。……偉大的戲劇家，真正的藝人，都不期待訂購，也不期待收貨商，他們今日在工作，明日在工作，永遠在工作。……」不息的勞作，正是獲取靈感的唯一法則。

關於後者，（指熱情）更特別重要。在我看文化之所以能發揚光大，正是由於：「從古以來，無論什麼地方，都是張着一捕捉人類心靈」的網，無論在什麼時代或什麼國家，都有把拯救人類於偏見及迷信之中的事情當過——而且正在當着自身工作目的那末一批人存在，無論在何處；於細末的自己享樂中間，都有想慰撫人類的人存在——（高爾基語）明乎此，一些自以爲沒甚麼感寫不出文章者，不是靈感的不肯照顧他，而是由於他的對生活沒有深刻的體念，和缺乏豐富而廣泛的情感，永遠等待靈感的人，將永遠得不到靈感的光顧，因爲天下固無從倖成功的事體，靈感也絕不是倖可以獲得。哥德會說：「人生常常以爲我是個特別的倖運兒，我也用不着哭訴和非難我的一生，但是老實的講我的一對無非

是勞動與工作而已。」

柏格尼依更譏刺那些以爲文學是輕巧事業，和可以獲得成功的人們道：

「誰若喧噪地追求空頭的光華，

誰若裝腔作勢夜郎自大，

在傲慢的宣言裏放些屁話，

而成日的

成日的

成日的

不事閱讀，

那誰就不知肉麻！」

到這裏，我們的空想靈感論者（或名靈感至上論者）可以回頭了，不要求知於天花板，不要選材於指頭，不要坐在亭子間中守候靈感，應該向艱苦中，向勞動中去吸取需要，向現實中，向生活中去發掘靈感。

## 靈感再論

——兼質徐賽先生——

藝術作品的完成離不開人類情感的因素，而「靈感」是接受外界印象之情感的敏捷召應，是如急風暴雨似的至情實感的來臨，這種至情實感有透過藝術式而流露的衝動。因此，靈感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但一般人由於對靈感之本性與產生的理解不夠，生出了錯誤的觀點，落入「靈感至上論」的泥沼，認為靈感是神秘不可捉摸的東西，須碰機會和等待得來，如果一旦獲得靈感，那麼藝術作品，無問題的就可完成。這是不正確的見解，筆者曾作了一篇短文靈感論（見大路半月刊第五期）以為糾正。

最近看到徐賽先生的藝術的靈感問題一文（見前線日報九月三日戰地版）徐先生首先讚揚十六世紀浪漫派作家的一每當月白風清的良夜，或狂風暴雨的山林廣野，他們獨個兒拿着畫件或稿紙，親自到自然間去追求靈感，他們愛好月亮和野風，不管夜深露重，獨個在荒野間癡心地凝想，就是在狂風暴雨的時候，也會單獨地到深山叢林里去親近自然，去探求那雷電、山谷、暴雨、風嘯的靈感（徐先生語）那種獲取靈感的態度，於是最後的結論是到自然去，找靈感去。照徐先生的這樣說法，無疑的是站於「為藝術而藝術」的立場，否定「人生的藝術」（Art for the Sake）主張自然主義的浪漫主義，同時認為靈感祇有從自然中去發掘。

關於「為藝術而藝術」與「為人生而藝術」之事，已是歷史的陳迹，從創造社會自動揚棄「為藝術而藝術」的錯誤主張以後，除去躲在象牙之塔裏，未見過天日的高貴藝術家之外，

誰都不會否認藝術是反映時代和刻劃現實的，藝術如離開了人生的需要而存在，那將毫無意義，所以這點，在這裏不多饒舌。

大時代展開在我們面前，侵略者與弱小者的戰爭，正義與暴力的搏鬥，光明與黑暗，革命與反叛……這些由人類血和淚交織而成的偉大現實，我們如不敢正眼相視，裁身接觸，去積累對人類之純真的感情，却來一再當月白風清的良夜，或狂風暴雨的山林廣野，獨個兒拿着稿紙，去探求靈感——那無異是叫廿世紀的我們，去學做十六世紀的浪漫派名士。

而況，是否就能守候到靈感，而定成「藝術的藝術」之作品，這是一個大問題？退一步說，在對自然的愛好靈感和追求中，即算隨時可以獲得靈感，而憑藉此種靈感所產生的作品，也不出自然主義為的極端放任何和個人主義的極端狂妄之範疇。這種藝術作品在目前需要嗎？無疑所得將是否定的答案。

因此，我們以為自然中誠然可以抓尋到靈感，但現時代現階段，我們不能向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廣大的社會，有力的實踐，纔是靈感的淵源，同時在月白風清或狂風暴雨中，癡心冥想，守候靈感，到底是十六世紀浪漫派的名士舉動，正確的合理的獲取靈感之態度，是先具備對人類以及一切事物的高度熱情，從而通過生活經驗，把握住情感波動的高潮。這樣的把握靈感，在其藝術作品的主題上，始具有正確性與價值性，也就是所謂永恆的

藝術性。(關於靈感的本質與產生，請參閱拙作靈感論)

在次，徐先生說：「要把握某一種自然的根據，必須得到自然的深沉的靈感的，這自然的推廣而能包括一切，某一種自然授與的靈感而產生的藝術而能包括一切，這才是真正的藝術，這種藝術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藝術品。」不容氣，這實在是偏見，是「爲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演譯出來的「自然主義與唯美主義」的偏見。托爾斯泰 (Tolstoy) 曾說：「如要正確斷定藝術，應首先不要把他看做快樂的方法，而視之如人類生活條件中之一部。」(見托著藝術論) 藝術的意義，不在自然之美惡的讚揚或咒詛，而在變革人類的生活與充實人類的生活，徐先生從純自然中獲取靈感的所謂真的藝術，在現時恰反成爲藝術的多餘了。

徐先生並以浪漫主義相標榜，而浪漫主義並不是徐先生說，祇是從純自然中找尋靈感，高爾基對浪漫主義的定義，曾說：「消極的(否定的)浪漫主義，是粉飾現實，或使人與現實相妥協，或將人從現實上拖到無任何結果的深淵的不可解，及愛，或死的思惟世界，拖到「智性」與見能所難於解決而祇有由科學纔能解決的那種謎裏去。積極的(肯定的)浪漫主義則想強固人類的對於生活的意義心，想在人類內喚起對關於現實的一切抑壓的反抗心。」(見高著我的文學修養) 因此，徐先生的對浪漫主義還祇是見到消極的一面。

討論到這裏，可以作一結束，總括說，藝術不能離開人類的生存要求，藝術之靈感不

能向自然去找尋。

## 是文藝動員的時候

人類而臨着空前的厄運。侵略的毒液，由魔鬼的口中，噴向地球的各個角落，反抗的火炬，照亮在正義的上邊，從亞洲、歐洲、非洲、奧洲；燃燒起的烽烟，織成了火網世界……法西強盜們以血腥的爪子，在吞噬同類，善良的人們，以血和肉換取公理和生存！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紅海、黑海……的無邊浪濤裏，掀起一股巨大的血流，這血流正染着強盜們卑污的血，善良者鮮紅的血，這巨大的血流，正澎湃的衝激着我們！

啊：偉大的世紀展開了，偉大的史詩揭幕了，是我們抬頭的時候，是文藝昂揚的時候！

文藝不僅是刻劃現實，謳歌現實，更具有推進現實，改變現實的力量，誰都知道，意大利詩聖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是促成意大利紛亂的政治歸於統一的因素。舊俄詩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詩歌是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驅信號，拜倫（Georg Byron）的作品，也給予歐洲民主政治以巨大的影響。

同時，文藝運動是一切運動的先導，一切運動必須通過文藝運動，始能獲得廣大羣衆的參加和護。歐洲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便是近世科學運動的開端。我國的五四運動，也是文藝以先鋒的姿態出現，那末在這個光明與黑暗、真理與野蠻交戰的當前，簡直就是文藝的時代，詩的時代啊！

爲何發揮文藝的功用，盡文藝在歷史現階段的認務呢？拿一句術語來說，便是要實行「文藝動員」了，所謂動員，就是要發動和集中所有的一切力量，「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配合戰爭的要求，去打擊敵人，即是消滅侵略魔鬼與法西斯強盜，但文藝動員，與一般動員不同，它固然與敵人作正面的戰鬥，把強盜們的擄掠、屠殺、焚燒、奸淫等瘋狂獸慾，和人類收類的卑污、荒唐、狡猾、欺騙等無恥行徑，予以儘情的揭露，深入的刻劃，將反抗者的衝鋒、肉搏、成仁、就義的英勇故事，和善良人們的辛勤、吃苦、誠摯、和愛的光明態度，儘情的歌頌，着意的描寫！它更要引導所有善良的人羣，走上抗建之道去摘取勝利的花果，和建設未來理想的樂園！

所以文藝動員，可以說有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重大意義；在積極方面是要緊緊把握時代的全貌，一一看清光明與黑暗，真理與野蠻的分野，一一作產生偉大作品的準備，開拓文藝永固的基礎！這一代的偉大作品是侵略者的崩潰，魔鬼們之末日的判書！在消極方面是通過文藝形式，使全人類都深刻地了解侵略者的瘋狂，魔鬼們的罪惡，一致起來撲殺流

類的響馬！這樣說來，就是文藝動員要能成爲一切動員的先導，必須通過文藝動員，才能達成一切的動員。

目前，正是我們政府頒布國家總動員法，要全國進行的時候，國家總動員法，實是決定我們對敵抗戰之勝負的關鍵。因此，更是文藝動員的時候了，由文藝的動員，使人人皆知國家總動員的重要，從而更使人人樂願實行，這點，文藝工作者是負有最大的責任呵！在這裏我熱烈的高呼！我們絕不能放鬆這個「文藝時代」！

### 希望于郭沫若先生

五四時代的後起之秀，郭沫若先生，高揚起新文藝的旗幟，爲其創造社會增輝不少。郭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詩（小說不敢恭維）具有火一樣熱烈，膠一樣濃的情感。他的詩集如「女神」「瓶」，小說如「落葉」，「瓶谷關」劇本如「三個叛逆的女性」等會經吸引過千萬顆青年人的心。青年們隨着他的筆觸而喜悅或憤怒，歡笑或哭泣！

不久文壇上議論紛紛說郭先生與魯迅爭坐中國文壇的第一把交椅，更有小評罵魯迅坐第一把交椅，郭先生坐第二把。其實，都是多餘的事情。魯迅有魯迅的風格，郭先生有郭先生的風格，魯迅長尖刺潑辣，郭先生的長熱烈豪放。怎可等量齊觀。放在樹上，個個天籟上釋出

誰是八兩誰是半斤呢？何況除魯郭之外，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作家，如果整個的評價起來，所謂第一把火云云，還是「捧就捧到天上」的說法！

之後，大概是由於政治上的關係吧，郭先生悄悄地溜到日本去做穩士去了，住在福岡岳家，和其日本夫人安娜大洗其海水浴，據說處在四面監視之下言行很不自由，所以郭先生便默默的埋首在古紙堆裏用工夫，我們也很少看到郭先生的作品了。（除非是零星的雜文論文之類）

在這期間，中國還是多事之秋，「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不斷發生，日本佬太惡，欺侮得我們喘不過氣來，似乎當時住在日本的郭先生，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表示，於是一些神經過敏的人對郭先生的態度担起憂來，其實，這是不了解郭先生處境的一種杞人憂天啊！

「七七」抗戰發生了，郭先生毅然棄了「兒女之情」，回到祖國，這種熱愛民族，輕視自我的精神，博得了新的崇敬，的確的，無數愛好文學的青年人對郭先生的未來抱有無限殷切的期望！

在五卅前後，以最狂放，最不揚形式，最大胆寫新詩的要算郭先生，對老詩抨擊最力，反對最兇的也要推郭先生，而當他廿六年從日本歸國時，却做了一首「五言」「七律」如那首七律是：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州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雖然淒婉悲壯，哀切動人，但不知爲什麼郭先生要採用律詩形式？

郭先生的從進攻舊詩到自己寫作舊詩，這一轉變的關鍵，也許是由於「考古」之結果吧？或許如陳獨秀所講，「三十歲以前是革命的，四十歲前後是保守的，上了五十歲便是退化的」以及普通謂的做人三部曲，「由尖而方，由方而圓」，因爲年歲使然？外人無非是猜測之詞，實情如何，只有郭先生自己心裏明白！

抗戰四年來，郭先生除在抗戰初期時發表了一些短詩如「抗戰頌」「人類」「進化的驛站」「血肉的長城」「相見不遠」等以外，便是一些皇皇大著，如「論文藝的民族形式與內容」等論文，此外關於純文學的規作沒有見到。難道在抗建綱領上明白規定，「言論出版自由的今天，還感覺寫文章沒有發表的機會嗎？郭先生身爲政治部廳長（現已離職）想來不致於如此吧？

而且非常奇怪，在郭先生戰後發表短詩中，很少能引起個人的興趣，（也許是主觀偏見）如抗戰頌——：

聽見上海空中的砲聲，

我自己祇有歡喜。

我覺得這是我們民族復興的喜砲

我們民族有了決心要抗戰到底。

我們的武器或許不如敵人，

但我們的民氣和士氣要增過敵人無數倍，

我們並不怕瀑氣，不怕細菌。

我們要以肉彈來把敵人摧毀。同胞們，我們大家振作起來，一點也不要失望，不要驚

怪，我們要抗戰十年八年，

抗戰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

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同胞們，我們放聲高呼，

高呼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

高呼我們民族鬥士的英武。

——抗戰文藝——

該首就比如吃淡而無味的壞西瓜，委實不過癮。不知道郭先生寫「女神」時的熱情那裏去了，勇氣那裏去了？難道抗戰的局面還不如五四時代偉大嗎？

有人說，郭先生現任軍委會，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郭先生是「文化官」不是「文化人」了。大凡一成了「官」就與常人不同，官有官的派頭，官有官的風度，官寫的東西，是「等因奉此」「官樣文章」，因此郭先生忙着做論文，擬繕稿，代刊物簽字，爲人家做序，不能專心於純文學的創作，原是難怪的事！

我想郭先生是不會「長此以往」的，說不定正在現實中集取活的豐富的題材，準備着若干驚人的傑作臨世。郭先生現在也不過五十左右，假如「人生百年」，那麼還有一半的時光可供努力，轟動世界的「浮士德」是歌德在八十一歲的高齡才全部完成的，如果認爲年歲大了些，就不能寫作，那是沒志氣人說的話！

何況郭先生還是去年才和某風頭甚健的某電影明星結婚，（恕我健忘，某明星的芳名記不得了）前途正無可限量哩。臨了，我寫這篇文章，不是有意非難郭先生，而是作爲我對於郭先生誠意的希望。

## 魯迅的悲哀

魯迅是一個藝術很深的文學家，這是誰都承認的。然而，現時的文藝界却把魯迅當作偶像般的崇拜，開口就是魯迅怎樣怎樣，提筆便寫魯迅說過如此如此。像煞魯迅在中國文壇上等於基督教眼中的上帝，把他抬出來就可壓倒一切。所以還鬧起什麼「魯迅風」啦，「

魯迅的語言「噁」，等等花樣，稱他爲「革命導師」，「青年導師」，「前進的思想家」等許多肉麻當有趣的名譽頭銜。於是一些青年人也隨聲附和，頂禮膜拜起來！

其實，在藝術地位上，我們固不能把魯迅估價過低，但其對於中國歷史的進程，並沒有多大貢獻，他的作品，正同他自己的身世一樣，只暴露了中國革命過渡時期的黑暗的殘餘面，沒有把握住光明的新生面！

從林祥嫂，單四嫂，閔士，扎乙乙，尤其是阿Q等人物的身上，祇能找出沒落的農村之陰影——辛亥前後的中國農村之陰影。從他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出一個現代的產業工人和新生人物！因此，他是代表沒落階層，不能代表新生階層！

爲什麼一個被人尊爲「革命導師」的魯迅，他的作品會代表沒落階層呢？這是由於他的生活使然，因爲作品必須根據實生活的體念啊！

除了少年時代拖着「橫濱清辯子」不去說他以外，辛亥以後，他在北洋軍閥和政客下面做過十四年不大不小的官，由部員，而科長，而簽事，步步高陞，鄭學稼說得好：「我由北廷十四年的歷史爲魯迅先生考證，計事奉過的大總統和執政，有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和段祺瑞六人，內中還有一個「洪憲皇帝」，依魯迅年譜報告，他只在一燕人張翼德」後代演復辟時，爲着辨子留在東京，按魯迅的辨子，是到東京留學時才剪去——素心憤而辭職」至於洪憲陛下時代，他會否有所「憤」或有所「厭」那就非不前進者，

所能明白了。在這六朝之中，魯迅的直接長官——教育總長由蔡元培先生起，把梁士詒組閣時立即辭職的黃炎培先生除去不計，共有二十七人，最後免他職的，是被他尊為「無恥」的章士釗……魯迅曾對人說，簽事之官，並不算區區，但當他恢復了官職後，又奉日後北平故宮寶物盜案主犯易培基為總長。」（魯迅與阿Q——中央週刊四卷三十一期）長長的十四年，魯迅的生活是沉湎於黑暗之中，他內心的悲哀是可以想知的，難怪他的作品，只有黑暗的咒詛，沒有光明的歌頌了！

被北廷通緝以後，雖是魯迅生活的轉捩點，心裏頭確有如阿Q似的一「革他媽媽的命」的感覺，然而，畢竟由於他被過去的生活基礎所限止，缺乏革命的勇氣，到了廣東，並未曾參加革命黨。還是溜到上海，在北四川路，大做日人內山完造的上賓？

這時的「魯迅」，似乎對過去的「周樹人」的生活，十分痛惡，雖然沒有做實際革命運動的決心，而我們魯迅先生的思想是「革命的哪」於是就大寫其憎惡現實，理想天國的文章，滿以為自己這樣的「左得可愛」，總可以獲得一頂「革命」的榮冠，却不料一般「假洋鬼子」（阿Q語）罵他是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被成仿吾等一場「圍剿」，弄得他「左」「右」不得，於是便「雜感」叢生了！

革命既沒有出路，照理我們魯迅先生，應該專心在文學上下工夫，用他的天才和修養，為中國文壇開些巨大的燦爛之花。可是他却不然，「我」一個人不能樣樣都做到，在文化

的意義上，長篇巨製自然重要的，但還有別人在：我是斬除荆棘的人，我還要雜感雜感下去……」（魯迅語——見雪峯等魯迅論及其他）便一直「雜感」到死了。雜感雖也不失為文學的有方形態，但無論如何終不能與歌德的浮士德，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但丁的神曲等等相比擬，何況他的雜感，多年是私人的辯罵，和冷酷的刺諷呢？這也就判定魯迅在文學上的成就。老實說就中國這一代的作家來說，魯迅還遠不及矛盾。

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便死在上海「內山書店」，喪事由「內山老板」一手辦包！這樣可知魯迅一生最知己的「患難朋友」，便是日人內山完造，他的寫作，當然也受內山的相當影響，在這裏使魯迅萬萬想不到的，就是他為內山友人，白白的利用半生！因為內山完造正是日寇派遺在中國的「特務首領」啊！不用說上海的內山書店正是日寇的特務機關？這是誰都沒有料到，還幸有我們魯迅先生的得意門人胡風，今年從香港脫險出來到桂林才說破的哩！（見本年桂林大公報，手頭無報，原文未能引出）胡風的話是不會錯的，因為他絕對不會故意侮辱魯迅的——魯迅泉下得曉，當比當年為人「圍剿」，不許「革命」時更要悲哀吧？

事情也實在有趣，死後的魯迅，為什麼會被人捧到天上，當作聖神似的看待，其實，這並不是魯迅的成功之處，相反的，他是又為人家所利用了呀！

造成捧魯迅風氣的，是一些別有企圖的「假洋鬼子」之流「借屍還魂」的手法，拿魯迅作

工具，散佈文化上迷信的烟霧，去愚弄一般純潔的青年，樸實的人們，這，只要一瞧，在魯迅生前許多反對他的人，咒罵他的人，而今都假惺惺的捧場，喝彩，就可明白是什麼一回事，難道魯迅的鬼魂把他們感應得如此嗎？抑或是魯迅的真正偉大處為他們所發現呢？否則，為什麼生前罵魯迅為「動搖的小資產階級」，「沒落的士大夫」，死後却尊他為「革命導師」，「青年導師」呢？這生前死後之間的距離真是太遙遠了啊！折穿了講，他們（指捧魯迅者）是「奉命」如此（當然客觀的導教者和青年人是例外）「假洋鬼子」背後，一定有一「真洋鬼子」的啊！魯迅假如看透現在一些人捧他的用意，他才要哭笑不得呢！

魯迅，我們不能否認他是一個很有造詣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自不能抹殺其地位，可惜的是，他生前既被人利用，死後又被利用，冥冥有知，其悲哀當更勝於我們了。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 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貳元

# 放論集

著作者 李素心

出版者 羣力出版社

發行者 羣力出版社

經售處 泰和尖兵書店

贛縣廣益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地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